

“陈济棠时代” 好到哪里去

“广州日报”资料室编写

广东人民出版社

PDG

出版者的話

本書全文原載于1957年10月10日至13日“廣州日報”
(原題——把現在和二十年前比一比)，它根據不可辯駁的事實，駁斥了右派分子所謂現在不如二十年前陳濟棠統治時代的種種謬論。為了配合目前的全民大辯論，特印成這個小冊子，以供同志們學習參考。

1957年10月

目 录

陳濟棠時代：地主蓋房子农民沒居住， 資本家蓋工厂工人沒飯吃.....	2
过去粮食缺乏靠洋米进口，現在轉过来变为余粮省份.....	4
陳濟棠帶給广东人民的是：農業破产， 絲業垮台，入超惊人.....	6
陳濟棠時代連紙厂、飲料厂也沒法开工， 順德县絲厂損失慘重.....	8
二十年前工商業的蕭条景象， 右派分子却說成是黃金时代.....	10
1956年广州市工業生产总值比1936年增長兩倍多.....	13
过去一人干活不能吃饱穿暖， 現在一人干活可养活兩人以上.....	15
过去工人工伤事故各安天命， 現在既有劳保、又有公費医疗.....	17

广州市有个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說：“人民生活最好是陳濟棠時代，那时建設多，生意好做。農民生活最好是日治時代，那时谷米貴。”這些話很惡毒。后一句，公然對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統治也歌頌起來了，這是露骨的漢奸說話，一聽就聽出來，不會有什么人上他的當。但前一句却說得陰晦些，而且更多的右派分子是不說后面一句而只說前面一句的。他們很鬼，對年輕人便說：“世侄，你年紀還小，過去的好光景你還沒有見過哩，你看，中山紀念堂是什麼時候建的呢？海珠橋是什麼時候建的呢？紙廠、土敏土廠這些工廠不是過去就有了的嗎？”對老年人又換一種說法，“你想想，從前的東西多便宜！多充足！有買油買米買肉都要憑証排队的嗎？”這麼一說，人們就比較容易着迷了，也有人糊里糊塗地相信，以為過去真的有過那樣一段所謂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那時的生產比現在多，建設比現在大，人民生活比現在好，因而跟着右派分子隨聲附和，人云亦云起來了。右派分子正是要使人產生資本主義制度好過社會主義制度的錯覺的，這是一個騙局。廣東有句俗話，“大話怕計數。”既然右派分子言之鑿鑿地講了大話，我們也就來計一計數，把歷史事實擺出來，看看他們不斷吹噓的所謂黃金時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陈济棠时代。
地主盖房子农民沒居住，
資本家蓋工厂工人沒飯吃

要計數，就要計政治的數。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打交道，不講政治是不对的。陈济棠是个軍閥，他在广东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支持下，同时也在外国帝国主义支持下，自1930年至1936年，割据广东，残酷地压迫剥削广东的人民。陈济棠的政权，和蒋介石的政权一样，都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权，当时的工人和农民，无论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是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奴隶。我们在回忆对比今昔的情况时，切不可把这最基本的情况忘記了。既然右派分子說“那时建設多，生意好做”，我們就应先問：从前那些建設，那些生意是归誰所有的？是为誰服务的？不先弄清楚这个問題，便去算从前的社会有多少財富，現在又有多少，这也很容易弄模糊了我們自己的立場。地主盖了房子，絕不是农民也有了房子住，資本家蓋了工厂，絕不是工人也有了飯吃。旧社会里，有了学校，不等于劳动人民子弟可以讀書，有了医院，不等于劳动人民可以看病。在从前，就算住的有高楼大厦，吃的有山珍海餚也吧，工人农民除了捱餓受气之外，是不能沾它什么光的。有些老工人回忆得很深刻，他們說：“中山紀念堂的確是从前建的，很漂亮，但是那时候我們工人能象現在这样进去开会看戏么？”店員工人曹仕明說：“陈济棠时代，我是做鞋的，但我穿了三年木屐。”那时候，沒有鞋子穿的人，何止曹仕明一人而已啊！珠江区的水上居民，从前就是通通都不許穿鞋子的。何止不許穿鞋子！还不許在岸上居住念書做事。那时候，劳动人民受尽了一切侮辱，搬运工人被称做“咕哩”，清潔工人被称做“垃圾婆”，理髮

工人被称做“剃头仔”，粤剧艺人被称做“擘口仔”。没有钱，就没有任何社会地位，甚至连伪市总工会组织章程，也规定凡“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不得为本会代表”。看，这就是右派分子们吹嘘为人民生活最好时代的政治。连无产者的代表也必须由他们这些有产者来当，这就是他们的政治。人民的敌人和人民之间，从来都是没有什么共同的语言的，他们之所谓农民，其实都是地主，他们之所谓人民，其实就是他们这一小撮剥削者自己，凡是我們說好的，他們就要說是坏的。因此对于他們拚命叫好的东西，我們一定要“打破沙鍋問到底”，一定要問：陈济棠是个什么阶级？是干什么的？

右派分子不敢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陈济棠统治了广东几年，他个人便成为拥有几千万元私产的大富豪了。在他统治的时期，卖官鬻爵是成行成市，明目张胆地进行的，买一任县长做，要化几万元到一二十万元不等，象台山县县长的市价便是二十万元。当时的广州和广东各地，都是烟赌林立的，以筹海防经费为名的赌捐，就是陈济棠反动政府的最主要的收入。（例如当时出版的官方刊物“新广东月刊”，关于1932年度的省财政收入就是这样记载的：“以各项税捐而论，以筹饷为最多，全年共收入1,927万，占收入总额47.5%，超过预算数凡455万元。”）由此也就可见，为什么当时和陈济棠关系最密切的资本家，恰恰就是当时广东最大的赌场——广州裕泰公司和深圳又生公司的老板霍芝庭了。谁也不会相信这样的腐败的统治集团，这样的腐败政府，曾经真的关心过国计民生，替广东人民做过好事。

那么，当时的真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1934年9月27日，陈济棠反动统治的主要策划者和执行者，当时的广东省政府主席林云陔在广东省自治区工作人員訓練班講演，說的就和现在的右派分子說的很不一样，他說：“詳細說來，广东的問題，自然多

得很，不过总括來說，广东目前最重要的問題，大概不外下列几項：1、民情散涣；2、民食缺乏；3、民生雕敝；4、民智低下。”（“新广东月刊”第二十一期）这就是当时的統治者自己的供狀，是反动統治帶來的必然結果。

过去粮食缺乏靠洋米进口， 現在轉过来变为余粮省份

粮食缺乏問題，是历来广东的反动統治者所不能解决的一个根本問題。这个問題，只是到解放后才解决了。1956年全省的粮食产量，比1936年（解放前最高的一年）增40%，自1952年起，广东省已由缺粮的省份变为可以有余粮外調支援国家經濟建設的省份了。这和陈济棠时代全省每年要缺兩三个月粮的情况相比，簡直是飞躍的变化。陈济棠时代，每年要从国外省外調进2,000余万担粮食。林云陔在上述的講演里就是这样說的：“民国以来，二十余年間，只有民国九年洋米进口76万余担，算是数量比較少的，其余历年洋米进口的数量都是很大，……十七年至二十年間，由900余万担減至500余万担，似覺可喜，乃二十一年又突增至1,300余万担，22年且达1,698万余担，这豈不是証明最近兩年来，本省米糧愈形缺乏嗎？以上不过單就洋米一項进口的数量說，已經这么可惊，至于洋面进口，平均每年60余万担，洋杂粮进口，平均每年20余万担，本国各省輸入广东的谷米、面粉及杂粮，平均每年400余万担，若一并計入，本省每年仰給于省外的粮食，便更覺巨大了。省内粮食这样缺乏，在平时每年外溢的金錢，以万万計，已經吃亏不少，若一旦有事，海口被人封鎖，人民且有絕食之憂，更是危險得很。”23年前的反动头子，自己說是人民且有絕食之憂，危險得很，現在的反动嘆罗，却說那时是民熙物阜，人

寿年丰。从前的农民，粮食打得少，还要給地主剥削去一半以上，現在沒有地主剥削了，粮食生产又增加了40%，但是現在的右派分子却裝作悲天憫人的样子，叫起“广东农民生活接近餓死邊緣”来了。把真正民食缺乏的时代說成是人人都飽嘔梁肉，把农民不但吃饱，而且有余粮可卖的时代，說成是生活接近餓死的邊緣，顛倒是非，真是莫此为甚了。

粮食增产40%，由缺粮省份变为余粮省份，这对于广东人民的經濟生活，对于广东的經濟建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所謂陈济棠时代，光为了买米吃，每年要送給外国人1亿元以上的銀子，这数字就比当时广州全市每年的工業生产总值还大了，这也就是說，每年把广州全市的工業产品通通給了外国人，也还頂不了每年洋米进口的賬。如果再加其他洋貨的进口，那数字就更大了。1933年广东省洋貨进口总额达26,920万海关元，入超达17,476万余海关元，均突破了历年最高数字。这还只是海关的統計数字，如算上当时猖獗的走私的数字，那就更大了。1932年入超数字比1933年小，但也已使反动头子林云陔不得不認為“入超的貨物，达14,000余万关兩，折合广东通用的銀幣不下3万万元，漏卮之大，实在是很可怕的”了。象这样每年傾箱倒箧地搜刮財富以供应帝国主义者的經濟掠夺，而不搞到民穷財尽，是没有道理的。

右派分子会說，洋米进口有什么要紧，只要人們有錢买得起就是了。关于当时的工人农民，有沒有錢买得起米吃，我們在下面还要說，現在先要問的，倒是：为什么同样是广东省的土地，二十年前出的粮食不够吃，現在出的粮食却有余？对这个問題裝糊涂是不成的，归根到底，这正是由于土地改革打倒了封建主义，農業合作化打倒了資本主义。以广州郊区为例：过去占人口8.26%的地主富农，就占有全部土地的65.34%，农民除了繳納地租田賦之外，还要繳納許多苛捐杂税，各項負擔占农民收入的50%；而

現在的农民却除了農業稅及地方附加糧以外，沒有任何其他負擔了。現在农民的負擔占其收入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1952年占8.8%，1953年占8.25%，1956年降至只占6.0%。至于农民收入，據前中山大學农学院农林研究委員會叢書農業經濟專刊所載“廣東番禺龍眼洞農家經濟概況”的1936年資料，和該鄉在1956年的實際調查資料對比，則平均每戶总收入折合谷子，1936年為41担，1956年為70.2担，1956年比1936年增71.2%；平均每戶純收入，1936年為19.7担，1956年為39.7担，增108.9%；平均每個勞動力純收入，1936年為11.0 担，1956年為24.5 担，增122.7%；平均每個人純收入，1936年為4.6 担，1956年為10.0 担，增117.5%。农民的實際收入，增加了一倍以上。這些資料，就可以有力地說明經過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之後，解放了生產力，對於農業生產發展所起的積極作用了。廣州郊區在過去號稱富庶之地，农民收入也還不及現在的一半，其他偏遠地區之貧困，就可想而知了。右派分子要把廣東省拉回到民食缺乏的陳濟棠時代去，就應該去問問农民肯不肯。

陳濟棠帶給廣東人民的是： 農業破產，絲業垮台，入超惊人

工人尤其不肯，因為民食缺乏再加上民生雕敝，事實上就是農業破產，工業也破產了。研究1930——1936年的廣東經濟情況，是不能不看到1929——1933年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恐慌對於當時的廣東經濟的影響的。當時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都在瀕於崩潰，惶惶然不可終日，在這種形勢下，而謂這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渺小一角，獨能一枝獨秀，欣欣向榮，這簡直是做夢。當時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使中國變為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廉價傾

銷商品的淵壑，中國原有的工業手工業便紛紛被這些傾銷的外貨打垮擠垮了。對於廣東，垮得最徹底的是蠶絲業。又加上因世界經濟恐慌而劇烈地減少了僑匯收入，這樣，在廣東就算過去有過的資本主義經濟的虛假繁榮景象，這時候也都給一陣風吹掉了。關於這種情況，當時的反動頭子林云陔也曾經講到過的，他在上述講演里這樣說：“廣東的人民經濟，向來有兩個重要的來源，一個是土絲出口，一個是華僑匯款歸國，但是近數年來，因為日絲及人造絲的競銷，本省的絲業，日就衰退，因為世界經濟恐慌及樹膠與錫的跌價，南洋華僑所經營的事業，多數倒閉，這兩種來源，已都現出失敗的景象來了。”到1936年1月，他又在廣東省參議會報告說：“自去年銀價騰漲，白銀外溢，源源不絕，因之通貨緊縮，市面周轉不靈，商業日趨雕落，農村乏力救濟，工業無從發展，外貨之傾銷日甚，入超之數日益增，凡此種種，均足以釀成雕敝之局，而增加失業人民。”這些話，和現在的右派分子所說的那時建設多，生意好做，人民生活好過的描繪，也沒有任何相同之處。

農業破產，絲業垮台，入超大增，僑匯劇減，這是所謂陳濟棠時代的廣東經濟所受的最嚴重打擊。1933年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大恐慌時期的最後一年，在這一年里，資本主義國家為解脫其本身危機，更加紛紛變本加厲地把積壓的商品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廉價傾銷，因此這一年廣東的入超便最大，而在整個入口總額中，洋米竟占43.84%，洋面占4.18%，其他舶來農產品占3.67%，這就不但把廣東原有的工業手工業擠垮打垮，同時也連農業都給擠垮打垮了。當然，垮得最多的還是工業和手工業。在這裡，先把當時絲業崩潰的情況擺一擺，就可以更使人明白，陳濟棠的反動統治，究竟是給廣東人民帶來了災難還是帶來幸福。現在的右派分子黃永安，1933年時是國民黨的省政府建設廳

蚕絲改良局制絲股主任，他在当时說的話，总不会是故意危言聾听，出統治者的丑的。我們且看当时他怎样說。

“先說絲厂，民国十八年，絲厂还有150余家，十九年便只得100家，二十一年只得40余家。四年之内，絲厂数目，縮到仅及三分之一，因絲厂停閉直接失業的女工，总有五六万人，直接失業的男工，总有三四千人，同时要知道，一家絲厂开工，最少可以养活3,000家蚕农，所以間接的損失，負担到农村身上或其他方面，当然是难以計算了。

“第二說到生絲出口数量，往年由广州輸出的生絲，有6万包或6万余包，去年縮到3万余包，絲价以前一担可以平常卖900元或1,000元港幣，去年今年只值500元左右，或至低至450元。我曾約略估計，五年前本省生絲出口，約值6,240万元，去年只值2,450万元，相差至3,800余万，此外水結廢茧的損失，还不在内……

“从去年起有許多絲厂，无人过問，租金可以免納。絲厂男职工，以前是論年給与薪俸的，后来生意不好，改为按月給与薪俸，当时絲厂雇佣，嘩然詫为奇事，从去年起，更弄到按日計薪了，……七年前，我去絲業中心容奇，当时热闹非常，真所謂紙醉金迷，笙歌夜夜，茶樓酒館，坐无虛位，現在呢，茧棧拆得七零八落，頽垣敗瓦，已景色全非了。您如果認識絲業中人，或銀業中人，他一定可以說出十几二十个一百几十万家产的絲業大富豪，近年因絲業而破产的經過。”

（摘自1933年8月黃在广州市无线电台的演講詞）

陈济棠时代連紙厂、飲料厂也沒 法开工，順德县絲厂損失慘重

‘黃永安的演講，是当时的統治者搞的所謂蚕絲复兴运动宣

傳。但是越宣傳，絲業的崩潰也就越厉害了。1934年5月的“新广东月刊”上，关于順德县的絲業情况，又有这样的报道：

“县屬絲厂，当民国十四年鼎盛时，統計在328家，降至迄今，照常營業者，仅11間，此11間之絲厂，均因积存旧絲，勉强开工，其能否繼續營業，尙难决定，現計停業絲厂損失之資本統計，綜在1,800余万元，此絲商破产者一。县屬地基，均植桑株，鼎盛时，其桑价每担价值，昂者几达10元，以中等計，亦在5元以上，近則仅值6角或4角5仙，不敷工料之所需，以县屬基地6,000頃計算，每亩約出桑叶10余担，农民損失当在3,000万元以上，此桑基破产者二。县屬农民，占人口半数，約在50万，类皆从事此業，近日桑价奇低，自行育蚕，但售出之价，每斤价值3角余，不及前价值十分之二，工料且不足抵偿，生活更难維持，此农民破产者三。县屬繅絲女工，27万余人，当絲業兴盛时，每工日得工銀六七角，近則絲厂停閉，失業者达20万人，即有工可作，日得工資，在3角以下，此項女工所得工資，恒借以供給全家生活，自失業后，家計大受影响，此女工失業者四。在往昔絲業最盛时，在于蚕絲業出造之际，每日由广州运現銀返順德各屬者，达30余万元，此項現金，从外国絲价得来，县屬商業，借以周轉，近則因蚕絲滯銷，業此者几至絕望，县屬商埠如大良、陳村、容奇、勒流等处，其最大之銀号，居其十分之七已倒閉，……其余各行商，均受絲業影响，无形中停頓，此金融恐慌者五。”够了，仅順德一县絲厂倒闭的資金損失就达1,800余万元，农民的損失达3,000余万元，失業工人20万，这几个数字，就足以使人触目惊心了。也許現在仍然有人怀疑这些估計数字有点夸大，未必确实吧。但絲的出口总值，在1922年为粤幣13,000余万元，1924年則更高达2亿余元，而在所謂陳濟棠时代，它竟低到只有二三千万元，这个每年土絲出口減少的貨价总值，也已大于当时广州全市每年的工業生产总值了。

这是有海关的統計可查的。而拿这几年間的順德一县絲厂倒閉的資金損失，和這期間反動政府在全省範圍內的工業建設投資數字相比，也可以看到這期間的所謂建設成就，多么虛偽可笑。據“新廣東月刊”1935年9月所載，截至此時為止，幾年來反動政府的工業建設投資，已完成的有第一蔗糖厂、紡織厂等八厂，合共實支仅889万余元，這尚不足上述一县的絲厂倒閉的資金損失之半，就是再加上當時尚在籌建中的紙厂、飲料厂、毛織厂三厂的預算投資，也仅为1,901万余元，略多于上述損失數字吧了。但是在所謂陳濟棠時代，預算投資最大的紙厂（投資800余万元），是並沒有建成开工的，飲料厂當時也沒有开工。

二十年前工商業的蕭條景象， 右派分子却說成是黃金时代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恐慌的狂潮，當然不只是襲擊了絲業而已，在當時的反動統治的推波助瀾下，整個社會的工業和手工業，都在不同程度遭受破壞。以下就是“新廣東月刊”1935年7月和11月記載的廣州市各行工商業概況：

（一）機織衫襪厂，民國十九年共有40余間，現倒閉者過半數有奇，僅存20余間而已，且幸存者亦須紛紛裁員減工。

（二）縫衣業，從前有工人3,000余人，現僅存長工三百耳，從前每家有工人七名者，現仅有三四名。

（三）泥水行，去年度倒閉120余間。

（四）木料行，最盛時全行約有百余家，工人約在3,000以上，現存十余家，失業工人約占工人总数三分二。

（五）鞋業，原有工人約七八千人，現只能收容半數，工金又減少了三分二。

(六)榨油業，民國十六年有70余間，現僅存30余間，營業較往年減十分五六。

(七)釀酒業，從前有300余家，最近所余者，僅得120余戶耳，入冬後，銷路未見暢旺，大部酒廠，多已停止製釀。

(八)制煤油業，年來受外商三大公司盡量平沽壓迫後，已由一百數十家倒閉剩餘58家。

(九)陶瓷業，石灣各地缸瓦業停工人數，計十之八九，工人失業甚眾。

(十)火柴業，有廠十數家，年來日貨大量侵入，土造火柴受嚴重打擊，銷路全無，停工人數，已居大部。

(十一)雨遮業，紙雨遮受日貨絕大打擊，布雨遮銷路亦滯。

(十二)制皮業，目下已入不振狀態，倒閉者時有所聞。

(十三)橡膠業，停工人數，已居多數，現下被裁工人日益眾多，聞有積欠工人工資甚巨，而無法支付者。工資亦減少20%。

(十四)織布業，原有90家，去年停歇20家。去年全省銷額不及300萬元，比往昔減少十之七八。

(十五)制電池業，被日貨排擠，銷途一落千丈，致資本雄厚出品精良之東亞廠亦被迫倒閉，其他各廠亦多數減少出品，辭退工人。

(十六)制汽水業，因農村經濟破產，四鄉銷路几不能保持十之二三，近日銷額几不及原來五分之二。

(十七)金銀器皿首飾業，年來倒閉者400余家，失業工人8,000余人。

(十八)制化裝品業，出品幾減十之三四。

這真是一幅景象蕭條的圖畫。而這恰恰就是現在的右派分子所說的黃金時代了。對於勞動人民來說，資本主義是根本不能

給人們帶來什么黃金時代的，它只能給人帶來枷鎖，帶來痛苦。且勿論在所謂陳濟棠時代，廣東的資本主義並沒有過什么真正的繁榮，即使它真的有過吧，它跟着也是必然要引起更大的經濟衰落和崩潰，并且它也一定在一边發展中，一邊就引起衰落和崩潰的。在所謂陳濟棠時代，也許真有過個別搞技術工作的人，幻想過所謂實業救國吧，但其結果怎樣呢？办了幾間新工厂，原有的工業和手工業却紛紛垮了，農業也不能避免破產的命運。破產的農民，失業的工人和手工業者，失業的鹽民漁民船民，失業的歸國華僑，紛紛流浪在城鎮的街頭，造成前所未有的龐大的失業群，據“新廣東月刊”1936年3月號所載，“廣東僑務委員會，據上海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將1935年我國全國失業總數估計，共達5,893,000余人，而廣東一省竟達157萬余人之多，遂在省別失業人數當中，獨居第一。”所謂實業救國的結果，竟是失業人員“達157萬余人之多，遂在省別失業人數當中，獨居第一”，這是很尖銳的諷刺，但是這幅諷刺畫上，在這一篇悲慘的史實里，塗滿了多少劳动人民的血迹啊！有些“聰明的有學問的人”也是很愚蠢的，因為他們一點也不懂得這樣顯淺的道理，當廣州的沙面還是帝國主義者的租界，白鵝潭上拋滿着帝國主義者的軍艦，珠江的內河航道上走着帝國主義者的輪船，在經濟活動方面資本最大實力最大的操縱一切的是帝國主義者的洋行，而在中國的政府里儼然人上的家伙則不過是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是軍閥、官僚、洋行買辦、地主、惡霸、土匪頭子、流氓頭子、大貪污犯，總之，都是一窩子吸血鬼；在這樣的情況下幻想搞什么實業救國，只能是緣木求魚，送羊入虎口吧了！而且資本家辦企業，其目的只是為他自己賺錢，從來也沒有什麼資本家，真正是為了發展社會生產，為了讓大家都有飯吃才來辦企業的。所以資本家越賺錢，劳动者就越要賣命。而且也不是資本家賺錢，社會的生產就發展了，這規

律有时恰恰也是相反的。請看1935年广州年鑒上的一段描述：“鹽業……近年生意大不如前，大凡各產鹽區歉收，則該行生意有利可圖，丰收則反為不利，蓋歉收則鹽存之貨，可以居奇，而丰收則貨多價賤故也。是年产鹽區均獲丰收，故本年鹽業，已非好景。”這說得很明白，資本家的想法和我們是不同的，他們根本也不会真正的去想过什么實業救國。

1956年广州市工業生产总值 比1936年增長兩倍多

發展生产是为了滿足社会的需要，这个原則，只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实现了。解放以后，我們不仅如上面所述，迅速地恢复与發展了農業生产，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也更迅速地恢复与發展了工業生产与提高了工人的生活水平。尽管广州地處国防前綫，不是国家工業建設的重点，广州的工業生产也还是远远超过抗日戰爭前的水平了。如以1936年广州市全年工業生产总值为100，則1949年的生产总值下降为93.1%，而1956年則上升为328.8%，增長了兩倍多了。（按1952年不变价格計算，1936年广州的工業生产总值为27,971万元，1956年为91,961万元，不包括手工業产值）自1950年至1957年上半年，七年半中，国家投在广州的工業建設投資总额达15,457.1万元，比解放前遺留下来的全部工業固定資产13,683.1万元，还超过13%。新建工厂23个，恢复与扩建的工厂146个。扩建規模，有些是很大的，例如紙厂，扩建后的生产能力就比原有的大四倍多，又如飲料厂，扩建的面积比原有面积大兩倍多。而新建的厂，規模就更大，如現在正在建設中的苧麻厂，罐头厂，玻璃厂，这都是我国同类工厂中規模最大的工厂。新建的紗

厂和华侨糖厂，也是大型的。右派分子硬說陳濟棠時代的建設比現在還多，能有什么根據呢？陳濟棠統治了廣東七年，他的政府對全省工業建設的投資，如以上面引述的截至1935年9月的實支投資數800余萬元算，則這期間的投資總額，僅約等於這個反動政府每年的鴉片煙專賣利潤的收入，而尚不及其每年抽賭稅的收入的二分之一。而這却是幾年中反動政府對全省的工業投資總數了。拿這和廣州市解放後的投資數字相比，是不相稱的；若把官僚們于搜刮之余聊作點綴的所謂建設，當作對於人民的恩惠，那就更是荒謬了。暫且拋開這個統治集團貪污盜竊的眼和他們所作的其他罪惡，不去算它吧，就是每年專賣鴉片煙和收賭稅兩項收入就近3,000萬元，這已經要把多少人搞到皮黃骨瘦，家散人亡啊！據1933年11月廣州市社會局的調查，5,253個手車工人中，就有730人染有鴉片煙癮，几乎是七個人中就有一个人吃上鴉片煙了，這還只是官方的統計，實際受毒害的，恐怕比這個數字還要多。在所謂陳濟棠時代，廣州市每年死亡的人口是常常比出生的人口更多的，就拿1933年這一年為例，這一年全市全年出生僅22,712人，而死亡的却達23,352人。死亡的比出生的還多，這就難怪當時的“新廣東月刊”關於廣州市各行各業概況的報道中，也認為製造棺材業“本無所謂景氣與不景氣而言，銷路暢旺與否，與社會經濟似無關係”了。試拿1933年全市的出生與死亡數字，與1956年全市出生66,123人，而死亡則僅為11,472人的數字相對照，則人民的生活，哪個時代好，哪個時代壞，就更加一望而知了。現在全市的人口比過去多了幾十萬，但一年中死亡的却比過去少1萬多人，還不到那時死亡數的一半；過去一年中死亡的比出生的還多六七百人，而現在一年中出生的却比死亡的多54,000余人。如果有誰看了這些對照的數字以後，還硬說過去的人民生活比現在好，那他就不如干脆說死比生好算了。